

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更加协调

顺应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创新社会治理

□李培志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需要更好发挥制度优势、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作出重要部署。需要看到,社会结构对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对社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们要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不断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一般来说,社会结构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主要包括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收入结构等。社会结构合理,整个社会才能和谐有序发展。社会结构与社会治理是相辅相成的。社会结构深刻影响着社会治理方式的选择,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下,社会治理各个主体之间协同配合的方式也会不同。同时,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够促进社会结构更加优化,使经济和社会更加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推动我国社会治理领域改革,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续写了“两大奇迹”新篇章。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我国社会结构也在随之变化。

从就业结构看,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大量涌现,开辟了就业市场新空间,拓展了劳动者就业增收收

途径。灵活就业主要包括个体经营、非全日制等就业方式,其在劳动时间、工作场所、劳动关系等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就业形态。2023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在2亿人左右。农民工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主要从事非农业的农业户口人员。2024年,全国农民工约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9亿人。新就业形态人员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人员,主要包括网约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互联网营销师等。从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来看,数字经济助推信息服务业快速发展,带来了相关行业从业人员的增加。这些就业方式激发了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新动能,也要求在社会治理中充分考虑这些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比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案例覆盖平台经济主要行业类型和常见用工方式,坚持“事实优先”的劳动关系认定原则,根据用工事实认定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从人口结构看,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阶段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人口负增长在总体上是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利弊兼有,正面效应如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倒逼经济发展

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等,不利影响包括劳动力减少等。在人口流动方面,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持续向沿海沿江地区、向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区集中,东部地区人口持续增加,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流动人口密集。2020年,全国11个主要城市群人口合计为6.3亿人,占全国人口的44.6%;27个省会城市(不包括直辖市)常住人口2.3亿人,比2010年增长30.3%。只有顺应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流动趋势创新社会治理,才能实现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比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去年9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抓紧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这些重要部署,有利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从收入结构看,新时代以来,我们党着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城乡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我们可以从统计数据中看到这些变化。从城乡看,202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2年实际增长75.4%,年均实际增长5.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2年实际增长111.4%,年均实际增长7.0%,快于城镇居民年均实际增速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以西部地区居民收入为1计算,2023年东部、中部、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分别为1.60、1.07、1.07,收入相对差距分别比2013年缩小0.10、0.03、

0.22。当前,要着眼于推动城乡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着力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总的来看,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化,既有正面影响,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实践表明,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让社会结构变化与经济结构变化相适应,使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为此,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部署要求,通过调整完善体制机制、创新社会治理来更好地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总结我国社会结构调整优化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围绕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和方向,加强制度建设,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实现人民幸福安康。在领导力上,建立健全党全面领导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在内容上,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在参与主体上,明晰各方力量职责任务和权责关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同时,及时跟踪研究社会结构变化,做好社会调查和预判,并坚持系统观念,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优化政策,注意各项措施的协调性、平衡性。

让担当作为蔚然成风

□谢兵良

担当作为,既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强调“改革发展稳定工作那么多,要做好工作都要担当作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广大党员干部要起而行之、勇挑重担,积极投身改革发展实践,以过硬本领展现作为、不辱使命。

何为担当作为?从字面上看,担当作为就是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发挥出应有的能力和能量,创造出应然的成绩和实效;从辩证法看,担当是作为的前提和基础,作为是担当的体现和成效,二者相辅相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事业的发展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做事总是有风险的,正因如此,才需要担当。有时候越怕事越容易出事,越想绕道走矛盾就越堵着道。相反,只有敢于担当,豁得出去、敢闯敢干,矛盾和困难才可能得到解决。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推动实施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当时,这项改革是有风险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和中青年干部轮训中心时回忆,“经过反复思考,我认为,林权改革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这个问题不解决,矛盾总有一天会爆发,还是越早解决越好”。经过深入调研、反复论证,推出了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形成了全国第一个省级林权文件。“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们就要不回避、不逃责,大胆地干、坚决地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诠释了何为担当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担当作为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境界、情怀,一种气魄、责任、勇气,一种智慧、能力、本领。

担当作为是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政治品格。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面对兰考风沙、内涝、盐碱“三害”,即便身患重病,也要“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当代愚公”黄大发,历时30余年带领群众在悬崖绝壁上开凿出一条“生命渠”,兑现了“水过不去、拿

命来铺”的誓言;80后扶贫干部邱军,在生命最后时刻写下“明年牛产业要做大,菊花产业要做强”的嘱托……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折射出敢于迎难而上、勇于闯关夺隘、勤于奋斗奉献的干部群像。新时代以来,正是广大党员干部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自觉把“小我”融入“大局”中,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才不断展现新气象。同时也要看到,现实中党员干部“躺平”“摸鱼”“划水”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有的遇到困难绕道走,碰到风险躲着行;有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只打雷不下雨”;有的层层“甩锅”,能拖就拖;有的信奉“洗碗效应”,缩手缩脚;等等。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既有党员干部政绩观错位、内生动力不足、能力本领不强的内在因素,也有担当作为激励保护机制有待完善等外部原因。

让党员干部担当作为蔚然成风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瞄准症结、科学谋划、综合施策。要着力加强理论武装,持续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化内化转化工作,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增强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内生动力;强化能力培养,通过精准培训、实践锻炼,促进党员干部优化知识结构,提高专业能力,增强实践本领;树立正确用人导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把担当作为的党员干部用起来,把不担当、不作为干部调整下去;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健全关爱激励机制,从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心理上关心关爱党员干部,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完善激励机制,选树、表彰和宣传一批担当作为的典型,激励党员干部见贤思齐、奋发有为。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新征程上,党员干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党把干部放在各个岗位上是要大家担当干事”的殷殷嘱托,树牢担当之志,提升作为之能,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自觉做勇于担当的奋斗者,跑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历史接力棒。

发挥人工智能的“头雁”效应

多措并举发展智能经济

□李涛 徐翔

合,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比如,智能交通系统通过融合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将交通运输、物流仓储、信息通信等多个产业紧密连接起来,实现了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催生了智慧物流、车路协同等新业态,推动了更具协同性和竞争力的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当前,我们要从全局视角统筹谋划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推动智能经济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为发展智能经济提供坚实支撑。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着力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为发展智能经济提供坚实支撑。早在2017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在重点任务中就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体系,要求聚焦人工智能重大科学前沿问题,兼顾当前需求与长远发展,以突破人工智能应用基础理论瓶颈为重点,超前布局可能引发人工智能范式变革的基础研究。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体系,能够为人工智能持续发展与深度应用提供强大科学储备,确保人工智能关

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此,要支持科学家勇闯人工智能科技前沿“无人区”,努力在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和理论、方法、工具、系统等方向取得突破性、颠覆性突破;全面提升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体系,在补短板上抓紧布局。同时,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立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处理好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推动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合力。

完善产业政策,为发展智能经济提供政策保障。产业政策是各国指导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能够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运用产业政策的形式不尽相同,但都不能完全抛开产业政策。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不断融合,推动智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离不开产业政策作用的充分发挥。在中央层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先进通信、集成电路、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度融合才能融出新质生产力

□王耀东

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相互促进、互为前提、相互交织、加速迭代的特点,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赋能,产业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转化载体和应用场景。我们要深入把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内在逻辑,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融合的基础是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一般来说,科技创新由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两个部分组成,包括“科学—技术”链条中的所有创新活动。在这些创新活动中,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突破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原创性科学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这一过程的起始端,拓展了人类认识自然的深度和边界,能够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为技术发明和突破提供理论前提和方向指引,是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最先一公里”。比如,2019年1月,嫦娥四号实现世界首次人类航天器月球背面着陆巡视探测,揭开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获得一批重大的原创性科学研究成果,为深空探测领域军民融合、创新发展积累了重要经验。技术突破表现为对原有技术的替代和超越。随着原创性科学研究不断深入,颠覆性技术突破不断涌现,各种新技术范式加速形成,对产业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成为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前提。当前,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许多基础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新技术、新产品,科学和技术的边界不再那么明显。我们要深入把握当前科技创新的新特点新趋势,通过加强自主创新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努力在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中赢得优势、抢占先机。

融合的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企业一头连着需求,一头连着供给,善于捕捉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创新机遇,是创新要素集成、创新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具有推动创新的天然动力。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能够更加精准识别技术创新中的堵点卡点和难点,针对需要解决的问题集中各方力量开展靶向攻关,打通科技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通道。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角度看,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能够在实现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突破的同时,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商业化应用全链条融合发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比如,面对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市场竞争激烈的局面,我国一些半导体显示产品龙头企业在推动企业内部自研的同时,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协会联盟等的协同创新,通过联合研发、委托开发、平台共建等模式,集聚各方优势资源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带动我国新型显示产业突破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产业集群规模不断壮大。这说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共进,才能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形成产学研高效协同的创新联合体,进而形成倍增效应。

融合的途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产业是生产力的载体,是生产力变革的具体表现形式。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突破只有通过产业化形成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才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变革正在快速推进。抓住机遇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才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其中,我国传统产业体量大,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通过融入新型生产要素,发挥“数据×”“人工智能+”等突破性科技创新成果的驱动作用,可以形成更高效率、更加精细、更高质量的生产方式,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代表产业的发展方向,能够拓展生产的可能性边界,扩大经济活动的类型和规模,深刻重塑产业结构,大大提升生产效率,从而实现生产力质变和跃迁,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又是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因此,要以重大前沿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培育壮大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量子信息、类脑智能、基因技术、深海空天开发、先进储能等前沿科技推动的未来产业,厚植发展新优势,培育增长新动能。

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以文化交流互动共绘全球文明新图景

□黄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在全球格局深刻变革的当下,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日益成为联结世界各国、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纽带。我们要深刻认识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意义,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形式,以文化交流互动共绘全球文明新图景。

构建多层次人文交流合作平台。构建多层次人文交流合作平台,能够推动各主体相互促进,共同营造丰富多元的文化交流生态。要加强政府间的文化交流合作,通过高层互访、文化节等活动,增进国家间的互信与理解,为民间交流提供有力引导和示范。例如,2024年“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通过举办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我国与东盟国家的人文交流合作,加深了人民之间的友谊。要鼓励社会组织 and 民间团体积极参与国际人文交流,开展民间文化交流活动、民间艺术团体互访演出等,促进文化交流。例如,在今年深圳国际民俗艺术节期间,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多国的特色民俗表演团队,与我国民俗艺术团体进行了精彩纷呈的演出交流,让各国人民直观感受彼此传统民俗文化,搭建起文化互学互鉴的桥梁。

创新人文交流形式。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人文交流形式已难以满足当前的多样化需求。应利用好数字技术和新媒体平台,创新文化传播的内容和形式,着力打造更加多元化和更具互动性的人文交流新样态。运用社交媒体、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方式,提高人文交流的覆盖面和触达率,使中华文化以更加生动的方式走向世界。比如,通过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展现中国传统节日、民俗风情以及现代都市生活,让世界各地的受众以更直观、更亲切的形式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新技术新手段,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使外国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参观我国历史遗迹和文化景观。比如,近年来,“数字云冈”VR系统通过参加展会等方式,让法国、日本、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观赏云冈石窟的精美造像,感受深厚的人文底蕴;VR技术让海外观众“漫步”于长城之上,领略其独特的历史风貌。此外,打造线上文化交流平台,如虚拟博物馆、线上展览等,为全球用户提供便捷访问和体验中国文化的途径。比如,“数字故宫”“数字敦煌”等通过线上展示我国珍贵的文物古迹,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领略中华文化的厚重历史底蕴。当前,这些数字化手段正逐渐成为国际人文交流的重要推动力,为全球文化互学互鉴开辟了新通道。

培养国际化文化传播人才。培养兼具深厚文化素养和国际交流技能的人才,是深化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支撑。语言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应着力加强语言教育,进一步推广汉语学习,扩大孔子学院的建设规模与影响力,让汉语成为连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桥梁。同时,不断完善国内高校的外语学科体系,加速培养非通用语种人才,以满足国际人文交流合作需求。近年来,“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众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学生来华学习汉语及相关专业,培养了一批既精通汉语又熟悉中国文化的国际化人才。在语言学习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提升国际人才的专业化能力。国际人文交流涉及文化、出版、艺术、体育、教育、旅游和学术等多个领域,需围绕培养高层次人才国际化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的核心素养与关键技能,以及构建高效顺畅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与输送体系等拓展平台、健全机制,为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推动我国地方文化走向世界。我国各地蕴藏着丰富且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推动我国地方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交流,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现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要深入挖掘和整理各地异彩纷呈的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具有国际辨识度和吸引力的地方文化品牌。例如,浙江通过举办西湖音乐节、西湖国际博览会等大力推广西湖文化,进一步提升了西湖的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我国地方文化的独特韵味。此外,可以推动地方文化的国际合作,共建文化交流项目,促进文化资源交流。云南省博物馆与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开展文化遗产保护联合研究项目,就是一次有益尝试。双方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究、展览交流等方面展开系列合作,促进我国云南与越南文博事业的深入交流。这些项目不仅展示了我国地方文化的魅力,增强了地方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更为深化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提供了多元化窗口和平台。